

# 中晚唐的苦吟之风及其成因初探

吴在庆

(厦门大学中文系)

## 中晚唐的苦吟之风

有唐三百年诗歌创作如百花争艳,流派纷呈。无论是初、盛、抑或中、晚,诗人们无不讲究诗艺,力求创新,以至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鲜明特色与成就。如果我们将视角定在创作风尚上,不难发觉中晚唐虽存在浅切诗风,但诗人的苦吟风尚是较初唐盛唐为普遍而浓厚的。这种苦吟时尚我们很容易在有关中晚唐诗人的诗歌创作评述,以及诗人们自身的述说中找到大量的例子,从而更加明确这一苦吟之风的确实存在以及它的生动表现。

宋李颀《古今诗话》云:“唐人为诗,常积思数十年,然后各自名家。杜少陵云:‘更觉良工用心苦。’岂特我哉。”(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本)葛立方借陈与义所言讲得更具体:“陈去非尝为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诗,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句句夜深得,心从天外归’,‘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蟾蜍影里清吟苦,舴艋舟中白发生’之类是也。故选语皆工,得句皆奇。”所说的唐人实际上乃偏重于中晚唐人而言,原文所引的诗句乃出自李颀、方干、卢延让、刘昭禹等晚唐诗人。欧阳修对晚唐人有异于盛唐人的这种苦心作诗之风也早有揭橥,他尤以唐末周朴为例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

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六一诗话》)周朴这种‘月锻季炼’的苦心作诗态度在晚唐确实极为典型。《唐诗纪事》卷七一记其苦心为诗及其对待诗歌一丝不苟的态度云:“性喜吟诗,尤尚苦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联一句,则欣然自快。尝野逢一负薪者,忽持之,且厉声曰:‘我得之矣!我得之矣!’樵夫鬻然惊骇,掣臂弃薪而走。遇游缴卒,疑樵者为偷儿,执而讯之。朴徐往告卒曰:‘适见负薪,因得句耳。’卒乃释之。其句去:‘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于诗句,欲戏之。一日,骑驴于路,遇朴在旁,士人乃欷帽掩头吟朴诗去:‘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东。’朴闻之急,遽随其后,且行。士但促驴而去,略不回首。行数里追及,朴告之曰:‘仆诗河声流向西,何得言流向东?’士人颌之而已。闽中传以为笑。”周朴这种入魔似的苦思,以及为纠正一字之误而追人数里的为诗态度,虽不免迂腐为人所笑,但从中我们却可领略到他作诗的苦心与认真。这种态度在中晚唐诗坛上并非仅有,类似的诗坛佳话典籍中多有称述。最为著名的是贾岛“于驴上吟得‘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初欲著推字,或欲著敲字,炼之未定,遂于驴上作推字手势,又作敲字手势”,以至不觉冲撞韩愈的故事(详见《鉴戒录》卷八《贾忤旨》条)

更为有趣的诗坛佳话可推晚唐的不少类似的“一字师”的故事：“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撰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五代史补》卷三）“张迥，少时苦吟，……有《寄远》诗曰：‘锦字凭谁达，闲庭草又枯。夜长灯影灭，天远雁声孤。蝉鬓凋将尽，虬髯白也无。几回愁不语，因看朔方图。携卷谒齐己，点头吟讽无致，为改‘虬髯黑在无’，迥遂看作一字师。”（《说诗乐趣校注·层进门》）上所记诸“一字师”事虽不无雷同之处，但这一现象却清楚地表明不少晚唐诗人极为重视诗艺，琢磨切磋诗句意境，不苟一字的苦心为诗的态度并已形成风气，故此类事多有发生，并为人乐道。

更为直接记述诗人苦心为诗状况的还可以举中晚唐的三位诗人孟郊、李贺、张祜为例。陆龟蒙《李贺小传》记孟郊任溧阳尉后，“或比日，或间日乘驴领小吏经募投金渚一往。至则荫大栎，隐岩筱，坐于积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还。尔后袞袞去，曹务多弛废。”李商隐《李长吉小传》记李贺“能苦吟疾书”，“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张祜虽倜傥风流，但做起诗来却也同样呕心沥血：“祜苦吟，妻孥每唤之皆不应，曰：‘吾方口吻生华，岂恤汝辈乎！’”（《唐才子传》卷六《张祜小传》）这些记述均极逼真地刻划出中晚唐诗人们的苦吟之风。

中晚唐诗人的苦吟风尚，更有力的明证，是其时众多诗人的自白之言，我们不妨引述若干以见诗人们作诗之苦心。孟郊云：“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夜感自遣》，《全唐诗》卷三三四，下引诗见于《全唐

诗》各诗人集，有的仅注诗题，不具注）贾岛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题诗后》，《长江集新校》附集）薛能云：“千题万咏过三旬，忘食贪魔作瘦人。行处便吟君莫笑，就中诗病不任春。”（《自讽》）方干云：“才吟五个字，又白几茎髭”（《赠喻凫》）；卢延让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苦吟》）齐己云：“还怜我有冥搜癖，时把新诗过竹寻。”（《酬尚颜上人》）如此之类自白举不胜举。

### 与苦吟之风有关的若干现象

中晚唐既存在明显的苦吟风尚，与此相关我们还可以觉察到若干现象。下面我们仅例举其中四个现象。

其一，就有唐初、盛、中、晚而言，我们可以感到人们对这种苦吟之风的记述与自白，中晚唐较初盛唐为多；而且晚唐似比中唐更为普遍，其苦吟之风似更为浓厚。

其二，苦吟诗人尽管也有显达者，但相较而言，一般多职卑位下，更多的还是未仕之举子、士人及隐士、处士、僧徒。在著名的苦吟诗人中，孟郊、贾岛、李贺、卢仝、方干、杜荀鹤、喻凫、曹松、齐己、储嗣宗、无可、周贺、周朴、尚颜、张祜、李洞、裴说、李昌符、刘得仁、李山甫、缪岛云、张迥、李韶、任蕃、周繇等众多诗人皆属此类。

其三，与上述苦吟诗人的地位身份相关，苦吟诗人多为贫寒穷窘之士。上举诗人大都如此，典籍诗文中即有大量的记述。即以《唐才子传》一书而言，如谓周繇云：“家贫，生理索寞，只苦篇韵，俯有思，仰有咏，深造阃域，时号为‘诗禅’。”记任蕃云：“榜罢进谒主司曰：‘仆本寒乡之人，…侍郎岂不闻江东一任蕃，家贫吟苦，忍令其去如来日也？’”记贾岛云：“初，连败文场，囊篋空甚，遂为浮屠。”宋张文潜亦致慨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

工。”(《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

其四,苦吟诗人多有瘦弱早衰者。早在盛唐时,即传有李白戏杜甫诗:“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事诗》高逸第三)杜甫亦有“知君苦思缘诗瘦”(《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之说。将苦作诗与瘦衰病联在一起讲的在中晚唐时屡屡可见。如薛能云:“狂瘦未曾餐有味,不缘中酒却缘诗。”(《春咏》)

上述四端,尽管一时难以作科学的精确数字统计以说明之,但它却确实存在。而其内在道理,应另作探讨,此不论。

### 苦吟之风的成因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苦吟在诗歌创作中早已有之,并非肇自唐代。但应该承认在中晚唐时更为普遍而浓厚。那么产生这一创作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今仅择论其中数端。

其一,在诗文创作中,古代文论家早就有创作时应“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陆机《文赋》下同)的凝神苦思的主张,也有“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追求。同时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特别是近体诗的日臻成熟完美,各种讲究诗艺诗格的诗论著作应运出现,至唐而趋盛,如元兢的《诗髓脑》、《古今诗人秀句》,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上官仪的《笔札华梁》以及六对、八对之说等。至盛唐,随着近体诗的最后完善,这种讲究诗艺的著作,至王昌龄而达到极盛的新阶段。他讲究诗艺的著作有《诗格》、《诗中秘旨》,其中论诗人的创作构思有三境、三格之说,讲究诗的章法句法的,则有十七势,如“含思落句势”、“理入景势”等。王氏论诗特重苦思立意,云“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凝心大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练意魄。”又云:“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今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均见《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这种对诗

境、诗意、诗格、诗势及对立片言为警策等诗艺的讲求与实践,至盛中唐之交的杜甫可谓是集大成者。为了达到“笔落惊天地,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下引杜诗仅标注诗题)的造诣,他苦心推求诗律,锤炼诗句,自云:“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文律早周旋”(《裴韦大夫之晋》)、“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真是达到了“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之七)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王昌龄、杜甫均是盛唐作家,他们在文论与诗歌上的上述主张与创作实践,均对中晚唐人产生直接的影响。从文论上来说,即有中唐前期皎然的《诗式》及《诗议》。皎然论诗注重体势、作用、声对、义类,同时也主张苦思,曾针对“不要苦思论”云:“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诗式》卷一《取境》)“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须绎虑于险中,探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冥之思。”(《诗议》,见《文镜秘府论》南卷引)。皎然的这一苦思主张,实际上是受了王昌龄的影响,同时也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文人的创作态度,并与王昌龄、杜甫等人关于诗歌创作的主张与实践,一起作用影响于中晚唐诗人,促成苦吟风气的形成。

其二,诗至盛唐已达极至,中唐诗人在极盛之后寻求发展,则需别创途径。此诚如清代毛先舒《诗辨坻》引谭友夏所言:“诗家变化,盛唐已极,后又欲别出头地,自不得无东野、长吉一派。”赵翼亦谓:“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可推广,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瓠北诗话》卷三)如前所论,杜甫为诗已惨淡经营,故有谋篇造句遣词之神奇,而后又经韩愈之开拓,加上其时其他社会风气之促进,遂有孟郊、贾岛、李贺、卢仝等人

的另开奇险怪异、瑰诡苦涩之诗风。并影响后来的诗人,如张祜、李洞、周朴、周繇等中晚唐苦吟作家,使他们继续沿着这条路子去努力追求创新。

其三,社会习尚之影响于文学创作,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因此苦吟诗风的出现也应与其时的尚奇好怪的社会风尚有关。李肇《唐国史补》所说的“元和之风尚怪”,已是人们所熟知的。元和时期的尚怪之风,正与其时韩愈、孟郊、贾岛、李贺诸人的显得特别突出的苦心作诗的诗坛现象在时间上相符合。其实这种尚怪好奇之风不仅在元和时期存在,在此前的贞元时期也已颇为明显(此请参拙作《韩愈怪奇险奥诗成因探赜》,《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而且这种风尚也延续至晚唐,甚至有渐趋浓厚的倾向。这从唐传奇题材在中晚唐间的变化即可得到昭示。中唐之后的传奇,其志怪记异,言涉神仙鬼幻的内容骤然多了起来,如牛僧儒《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李冗的《独异志》、裴铏的《传奇》、张读的《宣室志》、薛用弱的《集异记》以及《原仙记》、《仙传拾遗》、《灵异记》等专集,从其书名即可了悟其题材内容的怪异奇诡倾向。为数众多的晚唐传奇小说这一志怪记异的突出内容,使其时的陆希声不禁感叹道:“近睹小说者多矣,大率皆鬼神变怪荒唐诞妄之事,……此近世之道病也。”(《北户录序》,《唐唐文》卷八一—二,下引同)这一“通病”,其实正是当时人们更为好奇尚怪风尚的反映。“诗人之作本于风俗”,这一风尚在小说上表现如此,在诗歌上也必然有所影响,只是在表现上与传奇小说有所不同,更多的表现为意境、造句、用字以及所咏对象方面求新求奇求精细而已。

其四,唐代士子多走科举入仕之路,而为求及第入仕,则需干谒权贵显要或文坛名人,以为吹嘘援引。因此向他们行卷,呈上诗文以求得赏识,即是其时名场的普遍风气。这种风气至中晚唐时,随着举子的众多,登第者少,

举场的结为朋党,权势者的把持操纵,举子们的奔逐竞争就愈显得兴盛浓厚。在这种风气与趋势下,广大无依托奥援的贫寒士子,恐怕更需要走以文章干谒的正常门路,因此也就必须在行卷的诗文上下更多的琢磨研练,以求赏识援引入仕。方干的“直为篇章非动众,遂令轩盖不经过”(《偶作》)、“要且文章出众人”(《送弟子任秀才赴举》)、“临歧再看无余事,愿取文章达圣聪”(《别从兄部》)之言即反映了这些士子的心愿与寄托。那么当时怎样的文章才能“动众”,“达圣聪”呢?当然即需“文章出众人”,且要迎合被投献者的嗜好,而其中最畅销者即是那些奇异新巧之作。孙樵在《寓居对》中即说到这种情况:“今人取文,章章贵奇,一句戾意,全卷鲜知。”又说:“彼巧在文,摘奇摹新,……取媚于时,古风不归。”(《乞巧对》,均见《唐唐文》卷七九五)因此卢延让、李昌符在多次落第之后,遂悟出出奇制胜之道,《北梦琐言》卷七所记“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冲官道过,狗触房门开’。租庸张濬亲见此事,每称赞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舔鱼砧’之句,为成中令内见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为王先王建所赏。尝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八狗子也。’同书卷十亦载“咸通中,前进士李昌符有诗名,久不登第,……因出一奇,乃作婢仆诗五十首,于公卿闻行之。……诸篇皆中婢仆之讳。浹旬,京城盛传其诗篇,为奶姬辈怪骂腾沸,尽要搯其面。是年登第。与夫桃杖、虎靴,事虽不同,用奇即无异也。”两人为人所赏而成功的秘诀均在于搜出奇异之事入诗,正如孙樵所指出的“摘奇摹新”、“取媚于时”。在这种俗尚之下,怪不得诗人们要“自小僻于诗,篇篇恨不奇”(杜荀鹤《投李大夫》)了。

另外,与上述相关,士人们不管是为了行卷之需,或是为了获得诗誉,除了上述的以新奇怪异动人之外,更多的恐怕是精心构撰佳

什名句。而中晚唐时也多有标榜名篇佳句以及名篇佳句为人称赏荐举的社会风气,如(许)棠《洞庭》诗,有“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之句,人以题扇。“时号‘许洞庭’。”剧燕“工为雅正诗。王重荣镇河中,燕投赠王曰:‘只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重荣甚礼重。”(均见《唐语纪事》卷七十)。这种标榜称赏名篇佳句的风气在晚唐时极为盛行,故葛立方曰:“唐朝人士,以诗名者甚众,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分先达为之游谈延誉,遂至声闻四驰。”(《韵语阳秋》卷四)这种习尚风气之下,也就难怪有“潘纬十年吟古镜”(《唐摭言》卷十)之事了。

其五,在上述各点的综合作用下,中晚唐时期极为盛行的文人集会唱和,喜作联句、次韵等逞才使气的风气也促进了苦吟之风的形成。文人集会唱和自古有之,然而至中晚唐此风尤盛,且有异于初盛唐的多为达官名人集会唱和,而遍及于一般的官吏僚佐、文人举子。在集会时,他们往往喜欢“昼燕夜话,各征其异说”,且喜“志异”(沈既济《任氏传》)。即是途中相遇,也爱“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李公佐《岳渎经》)这种喜话奇异的风气,不仅使文人们创作出作意好奇

的传奇,而且也会促进诗歌创作追求奇异的倾向。随着文人集会的更为普遍频繁,唱酬之作以至联句、联唱、共赋一物一事之类的诗歌也就增多了。而在这种场合下,文人们别出心裁,苦思冥搜、争奇斗怪以逞才使气、争胜扬己。贞元、元和年间韩愈与孟郊的唱和联句即是这一作风的典型例子。如《远游联句》孟郊出句云:“观怪忽荡漾,叩奇独冥搜。海鲸吞明月,浪岛没大沓。我有一寸钩,欲钓千丈流。良知忽然远,壮志郁无抽”;韩愈对曰:“魑魅暂出没,蛟螭互蟠谬。昌言拜舜禹,举帆凌斗牛。怀精馈贤屈,乘桴追圣丘。飘然天外步,岂肯区中囚。”(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这类联句真可谓“捕逐出八荒”,“百怪入我肠”(同上,卷九《调张籍》)。

上述五端都从各方面促成了中晚唐苦吟之风的形成。自然这种苦吟之风的形成是各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对于具体的各个苦吟诗人来说,则可能是全部或其中的某几种因素使然,很难一概而论。当然,形成中晚唐苦吟之风的原因尚不止上所揭示者,我们只是举其要者而已。比如中唐起的文人的好古复古的思潮,恐怕与苦吟之风也不无关系。

(责任编辑:夏涛)

(上接第121页)韦氏当时“即席听之,退而默记”,三十多年后方始录出,“传之好事,以为谈柄”的,难免不会记错。所以,二书之言很难说有什么确据。

其实,对于此说前入久已生疑。如五代时刘昫等修《旧唐书》,大约正是嫌刘、韦二家之言无征,故仅云刘希夷“为奸人所杀”(《新唐书》不载刘希夷事迹),并未指证宋之问。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则云:“吾观之问集中,尽有好处,而希夷之句,殊无可采,不知何至压杀而夺之?”明确地表示了疑问。金·王若虚《滹南诗话》更说:“此殆妄耳!之问固小人,然亦不应有是。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何等陋语(这个评价当然大可商榷),而以至杀其所亲乎?大抵

诗话所载,不足尽信。”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说得尤为确切:“此因之问品属下流,而以恶归之。其实宋之诗高于刘,不用攘窃他人也。杂说不足取,每每如此。”他还分析了此说产生的原因。

由此可见,此说似不可从。

<sup>1</sup> 《唐新语》卷八。<sup>④</sup> 《剑宾客嘉话录》第八条。<sup>④</sup>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1161页。<sup>1/4</sup> 四部丛刊续编本《宋之问集》卷一。<sup>1/2</sup> 《新唐书》卷二二《文苑中》。<sup>3/4</sup> 《唐代诗人丛考·杨炯考》。<sup>⑧</sup> 《唐才子传》卷一。<sup>⑨</sup> 《旧唐书》卷一九《文苑中》。《剑宾客嘉话录·自序》。《旧唐书》卷一九《文苑中·乔知之传》附。《临汉隐居诗话》第十四条。《滹南诗话》卷一。《唐诗别裁集》卷五。

(责任编辑:夏涛)